

■新作聚焦 张炜长篇小说《河湾》:

“古船”航入现实“河湾”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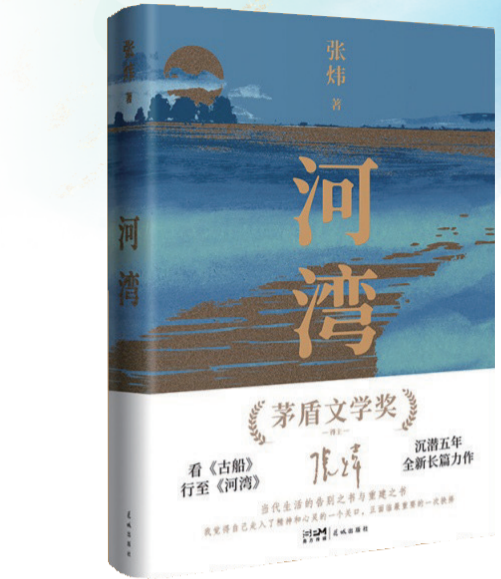
□张丽军

张炜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古船》塑造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中国思想者形象,苦苦追问如何避免历史的杀戮、追寻中国的共同富裕道路。2022年,张炜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河湾》,延续了现实主义精神,以一种思想家式的探索风格,高容量、高密度、深度开掘,对历史与现实、爱恋与厌倦、罪与罚进行了来自家族和心灵深处的质询与追问。《河湾》不仅把张炜以往小说叙述中的情节、场景和元素勾连起来,而且叙述结构、人物形象和思想探索等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可以说,《河湾》展现了张炜精神世界的新探索、新变化、新生长。

一个旋的好,两个旋的坏,三个旋的死得快。这是在家乡流传很广的俗语。我小时候头上长着两个旋,被人说犟,《河湾》的主人公傅亦衡就是头上长着两个毛旋的倔强之人。宁折不弯、不折不挠、九死而未悔,这种强烈的、悍性人物性格,是张炜小说人物形象性格体系中最重要特征。《河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承继和发展了张炜小说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古船》中的隋抱朴为内心的精神困感和现实实践路径而苦苦求索,《独药师》中的小儿子李昨非追求着来自一份倔强女性的倔强爱情,《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为道路的迷失而苦苦寻找新的救赎之道。他们都是一个个不与世俗苟合的倔强灵魂。而《河湾》中有着两个毛旋的傅亦衡既有着以往人物精神谱系的倔强性格,又有着新的身份、使命和追求。《古船》《独药师》《艾约堡秘史》中的家族叙事都是集中于父子两代人身上。《河湾》则呈现为三代人的家族叙事。主人公傅亦衡是以三代人的身份开始了历史的深层叙述。

《河湾》以讲述“访高图”开始,谈及对历史和当代“高人”、“奇人”的仰慕和追寻。而实际上,小说向我们展示的傅亦衡和“隐婚”的女友及其家族人物个个都是“奇人”,是一个个倔强的灵魂。如同《艾约堡秘史》,《河流》以一个绝色美女开始了故事的叙述。但不同的是,《河湾》中的帅哥傅亦衡和美女洛迦在一个散发着蒿草气息的草垛相遇。这不仅让出身乡村,熟悉蒿草独特清香气味的我读来倍感亲切,而且喻示着这份爱情的美好与纯洁。更让人惊奇的是,洛迦美女与帅哥亦衡约定“爱情保鲜法”,“分开,彼此独立,和而不同,相敬如宾;一生热烈、真挚、渴望”,过一种秘密而不示、各自独立而又血肉交融、永不“厌倦”的爱情生活。面对洛迦的“隐婚”要求,亦衡是无力抵拒的,只能说“我愿意”。洛迦希望“我永远是一个持花少年”,隔一段时间预约幽会,“像个处女那样满面含羞地接过仅有的一支花”,在新房与“我”缠绵。这个故事本可以继续讲下去,乍看似一个不同于流俗的爱情传奇。然而,与洛迦一趟隐秘的老家之行,改变了小说叙述的方向和内容。

在绝色、隐婚之外,洛迦有一个隐秘的身世。在半岛各路势力混战的年代里,善良优雅的绅士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他们的儿子被匪徒们杀害了,只有洛迦的母亲侥幸得以幸免。洛迦母亲不仅漂亮而且有文化,被区长发现了受到重用,但因为身世问题,被关了起来。了解情况的区长为她申诉并将降职,又因为与她结婚而被驱逐出城。后来为山上矿工的孩子当老师,他们有了三年的幸福时光,洛迦出生了。“这事没有完”,因为不停地申诉,男子被关了起来而最终死去。因为偶然的的机会,洛迦母亲被一位位高权重的首长看到了,与之一起有了一段新的婚姻。洛迦的继父曾是半岛武装中的游击队员。就读中学的洛迦开始了与继父的通信。面对洛迦咄咄逼人的询问,病重的继父还是尽力回答了她的疑问,“相信爸爸,我是极痛恨、



《河湾》显现出张炜对世界、人生、历史和现实的新思考、新探索、新向度,乃至有了某种穿越历史苦难、现实抵抗、精神救赎之后的安宁与依归。

极痛恨他们。爸爸跟他们对着干,决不认输。爸爸身上的伤就是明证”。在最为严厉的问询中,继父“在肝病危厄、朝不保夕的煎熬之期,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偷偷给外地的养女写信”,坦承内心。这在亦衡看来,何尝不是另一种“申诉”、另一种爱的表达?对继父不为母亲申诉的事情,母亲告诉洛迦:“他比我们更懂也更明白,所以连试都没有试;没有用,‘他说世上有个奇怪的道理,那就是一般的冤屈和是非可以申诉,黑白分明的大冤屈是无法申诉的。’”道理竟是如此诡异。

“如果‘黑白分明的大冤屈无法申诉’,那么是否可以保存一份完整的记录?这应该是谁都无法剥夺的权力。‘无法申诉’不等于‘不作申诉’,申诉是生命的自由。”面对洛迦家族亲人不幸遭遇的血泪倾诉,傅亦衡开始了自身家族史的书写,要为历史和未来留下一份生命的记录。“我”父亲被经营产业的叔父安排,救出了人称“仁公”的革命重要人物,并约定伴随革命。但是,父亲到了约定的地方却没有找到“仁公”。患眼疾重病的父亲,幸运的是遇到了外祖父一家人,与护理他的母亲相爱结婚了。不幸的是,救治了无数人、交结革命志士的外祖父被“半岛王”杀害了。更大的不幸是,父亲的叔父被镇压了,父亲成为了“伪区长”嫌疑犯。为洗清这一嫌疑,父亲讲述了和叔父称“仁公”首长的事情,并提供了带有“仁公”照片的报纸。但是审讯者说,你说的人是我们的首长!你认错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你!父亲因查无实据,被放出来了,接受“劳役”。母亲喊出了“‘仁公’不仁”,但是父亲至死不信“仁公”抛弃了他。而“我”作为“伪区长”嫌疑犯的儿子,很小就在半岛流浪。考上大学的“我”与洛迦的相遇,让《河湾》的两个主人公及其家族有了交集,呈现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半岛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残酷性。

《河湾》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叙述之中,而是继续往前发展,以一种“当下现实主义”精神视域,呈现出令人再次无比讶异的魔幻般传奇新现实。与洛迦的“隐婚”,让很多人以为傅亦衡是单身的“童男子”,为他介绍的女性众多。可贵的是,傅亦衡始终不为所动,深深沉迷于洛迦的绝色美貌、高贵气质和“爱情保鲜法”试验之中。“我觉得她身上随便哪一处都成诗,眉毛,眼睛,嘴巴,包括胸与肩。不敢想她的臀部,那儿至美,让人觉得凛然不可侵犯。”尽管在心底不止一次告诫自己,因为美的崇拜,“我会让渡一部分尊严,哪怕在特殊的时刻、在某一天,哪怕事关重要的原则和立

场”。在知道洛迦隐瞒了财富,隐瞒了“宫殿”等事情后,“我”依然依据“不干涉隐私”的原则来表达对美的膜拜和部分尊严的“让渡”。但是,当听到暴露罪金集团的保洁员耿杨被切断食指、持续污名化、被驱逐出去无人敢雇佣以至于以捡垃圾为生的时候,“我”愤怒了,对那个高高在上、控制一切、“什么钱都赚”的“女王”,心生“厌倦”。与挚友余之铿的妻子苏步慧一样,“我”的心也曾碎了。“我”所爱的美丽、纯洁、高贵的“公主”,那个曾有着与海深仇的、与残忍匪徒不共戴天的、一遍遍质询“血污历史”的“公主”,那个曾对毛驴、狗等动物无比依恋的“公主”,曾几何时泯灭了良知,开始了欺凌,变成一个贪婪、毒辣、冷酷、“什么都不在乎”的“女王”。这是“我”所难以接受和认同的,更是无法再与朝夕相处的。“我”出走“河湾”是必然的——“河湾”那些可爱的动物、那些质朴的孤独的心灵,那单声杜宇的鸣叫,那静静流淌的河流,才是人性的疗伤之地,更是对抗贪婪的坚守之地。

《河湾》从三代人家族讲起这个“半岛”的历史,控诉曾有过的历史之“恶”。外祖父和绅士为何被匪徒杀害?“仁公”为何不仁?大冤屈为何不得伸张?这恰恰是从《古船》就已开启的历史之问。而《河湾》,就是在这艘“古船”航行到了今天的“现实之河”,而流变为从历史到现实、从族群到个体的新的生命质询。哪里有恶,哪里就有人性仁义与善的光亮。在《河湾》中,我在深深感受到“恶之花”的同时,又强烈感受到那比恶更让人激动与感慨的“善之根”。“父亲”至死都保持的对“仁公”的信任与寻找,洛迦父亲只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停止的“申诉”,以及我和“河湾”朋友对耿杨的保护之举,都彰显了人性之善和对恶的抵抗。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在一声声杜鹃的鸣叫里,那个从“古船”航行的不息的倔强头颅及其灵魂,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憩息肉身、安放心灵的地方,那就是有着众多可爱动物、茂密树林以及世外“高人”的“河湾”。

在《河湾》中,我读到了张炜的《古船》《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和《爱的川流不息》等作品所呈现的熟悉的东西,那些一刻也不曾忘记的历史,那颗苦苦追索者的灵魂。欣喜的是,《河湾》显现出张炜对世界、人生、历史和现实的新思考、新探索、新向度,乃至有了某种穿越历史苦难、现实抵抗、精神救赎之后的安宁与依归。这正是《河流》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也是张炜之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新探索之所在。

■关注

近年来作家老藤处于创作的喷发期,相继推出了长篇小说《战国红》《铜行里》《北地》《北障》等,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仅以长篇小说而言,其作品题材选择广泛,创作方法各异,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广阔的艺术空间。《战国红》聚焦脱贫攻坚,描绘驻村干部带领村民脱贫的过程;《铜行里》讲述一个城市近百年来三代铜匠的故事,记述了“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北地》则通过一个老干部对东北工作40年的回望,表现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历史,致敬北大荒的拓荒者,而《北障》则为我们讲述了最后一个猎手的生存处境,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对狩猎文化做出了独特的思考与回望。

在《北障》中,作者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奇异猛兽的森林世界,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警察、猎手、猎物之间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中有两条相互交织的叙述线索,一个是三林区派出所胡所长与“一枪毙”金虎之间的博弈与对峙,胡所长是当过巡警队长的复转军人,上任伊始就撂下狠话:要当三林区猎手的终结者,他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收缴枪支,严禁狩猎,而金虎则是“一枪毙”,是三林区五大猎手的旗帜,身上有着驿站人的彪悍血液和猎人传统。他曾在枪术比赛中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胡所长,但是在胡所长的严格禁令之下,也只得交出了心爱的猎枪“红箭”,但胡所长对他仍不放心,将他列为重点盯防对象,屡次警告他不要“事儿上见”;另一个是金虎与猎狗之间狩猎与被猎的过程,在上缴猎枪后,金虎到朋友苗魁的公司去牧羊,苗魁的儿子出生后夜啼不止,到医院检查也没查出毛病,巫医莫义玛开出的药方是戴一顶狼狗皮的帽子,为此金虎和苗魁不得不上山猎狗,围绕“猎狗”,作者在胡所长与金虎、金虎与苗魁、苗魁与高老大之间设置了层次丰富的矛盾,而金虎与那只充满灵性的猎狗斗智斗勇的过程也愈发一波三折——猎狗咬死了金虎的爱犬“红葵”,接连吃掉了金虎当作诱饵的四只鸡,但金虎仍坚持以设套的方式猎狗,苗魁暗中邀请了持有猎枪的猎手高老大,在故事的最后,金虎带了一只小羊羔作为诱饵,设置在四方台蹲守,没想到高老三也出现在四方台,突然向那团灰色的影子开枪射击,到这时他们才发现,被射杀的是一只狡猾的三条腿的狐狸,而那只猎狗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说以金虎的视角展开叙述,从多方面呈现了他作为最后一个猎人的尴尬处境,在理性上他支持禁猎的决定,所以毫不抗拒地上缴了猎枪,对胡所长的咄咄逼人也是一再忍让,但是在情感上,他又对猎人的传统和生活习俗充满眷恋。小说通过金虎这个人物,为我们介绍了驿站人的历史、猎人之间相处的规则与礼仪、充满神秘气息的狩猎禁忌,具有地方色彩的丰富狩猎知识,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远离现代人视野的新奇的狩猎文明,作者笔下的三林区、四方台和菠萝河等地理空间,以及飞龙、猎狗、野鸡脖子蛇、山鲑鱼等珍禽野兽,也呈现出一个神秘、恐怖而绝美的森林世界,为读者带来了新鲜的阅读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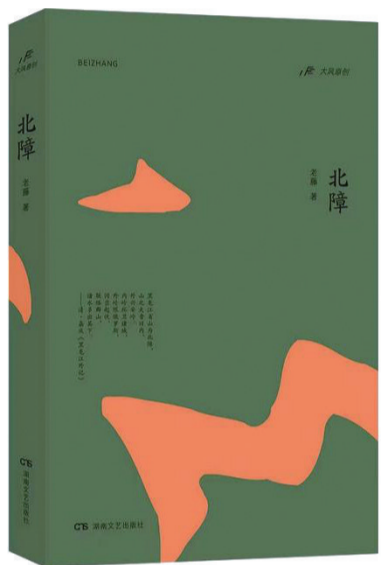
作者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书写狩猎文明,也从狩猎文明的角度观察现代文明,在狩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构建了一个空间。在这里,作者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而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发掘出了“适可而止”等猎人传统,这也是金虎等猎人可以接受禁猎令的内在原因,面临森林毁灭、野兽消失等困境,他们同样萌生出了保护生态的强烈愿望,他们是与森林、野兽共生的,一旦森林与野兽消失殆尽,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将不存在了。但是另一方面,禁猎令毕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在情感、心理和生活习惯上不得不适应新的节奏与方式,作者以金虎为中心讲述的最后的猎人故事,可以说是狩猎文明的一曲挽歌。

但与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不同,面对狩猎文明的消逝,作者并没有以挽歌的形式进行书写,也并不执著于续接即将消失的文明,而是在一种新的更为开阔的视野中,让我们看到了狩猎文明的消失与生态文明的新生并存的状态,小说中的胡所长虽然倔强、强硬,但却是新生文明强有力的执行者,他与金虎之间的对立,既是个人之间的博弈,也是狩猎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峙,作者在理性上站在胡所长的立场上,但却对金虎报以极大的同情与理解,也写出了一个猎手在不属于他的时代与传统生活方式告别的艰难,以及他看到森林再生、野兽归来时的欣喜。

在金虎身上,《北障》既写出了一种文明的消失,也写出了一种文明的新生,这部作品讲述最后一个猎人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青翠的森林世界,不仅是老藤作品中题材最为独特的一部,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生态文学做出了新的探索。

最后一个猎人的生存处境

——读老藤长篇小说《北障》 □李三雷



内蒙古举办文学十年成就展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文学馆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书写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十年成就展”在内蒙古文学馆开展。展览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示内蒙古文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建党百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展示十年来政策扶持、文学交流、文化惠民、人才建设、文学阵地建设等方面的成果。第二部分以照片和颁奖词的形式,展出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自治区文学创作龙嘎奖的作家及其创作成果。第三部分以书籍封面、刊物目录、文章节选、采访图片、手稿、书籍等形式,展示内蒙古各文学门类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第四部分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文学理论评论对文学精品创作与传播发挥的导向作用。第五部分是文学翻译成就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内蒙古翻译家协会联合推出《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十年来翻译出版了528部(篇/首)作品,架起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文学桥梁。第六部分以内蒙古文学杂志社近十年的工作为主,展示文学杂志社在培养人才、发表作品、组织文学活动方面的成就。(蒙文)

“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与文论话语构建”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7月9日至10日,“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与文论话语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19届年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批评研究院”等联合承办。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次大会旨在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共享新见解,探讨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新表达、新方向、新形态,为我国文艺理论在当下获得更多话语空间提供助力。中国社科院大学教师张江、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黄兆信、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高建平分别致开幕辞。张江针对“如何建设中国自

己的阐释学话语”谈到,中国阐释学的基础建构应当从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和经验出发,落脚于当代文化实践。他还从阐释学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公共阐释的定义与内涵如何界定、中国阐释学的历史谱系与理论依据何在等方面,详细阐释了建构当代中国“公共阐释”理论的可能。黄兆信在欢迎辞中介绍了杭州师范大学近年来在理论研究上取得的佳绩,希望此次会议能够促进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研究的深化与拓展。高建平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发展历程,并表达了对与会青年学者的期许。开幕式后进行了第一场大会学术报告,分上下半场举行。在上半场,高建平、杜卫、张政文、许明、谭好哲、周启超、姚文放等学者围绕文艺理论的本土化、公共阐释、学者的理论操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观点。在下半场,高楠、金元浦、赵炎秋、张犀、丁国旗、李春青、陆扬等学者围绕文学理论的中国范式、元宇宙、延安《讲话》的价值与意义、“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等现象和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第二场报告中,王宁、欧阳友权、宋伟、刘方喜、朱志荣、苏宏斌、赖大仁、邢建昌、泓峻、刘康、徐爽等海内外学者围绕数字人文、网络文学批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创新发展、中国古代文论思想资源的阐释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会议为期两天,共开设了8个线下分会场和5个线上分会场。闭幕式上,各分会场代表汇报了各自会场的发言情况。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致闭幕辞,高建平做学术总结。

《扬子江文学评论》举办“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工作坊

本报讯 近日,《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了“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工作坊线上会议,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近20位青年评论家及青年编辑针对当前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可能性与路径展开交流,为青年写作把脉开方。本届工作坊倡导“说真话、说真话”的批评精神,围绕青年写作中的具体个案评述,针对青年写作的内涵、风格、创作倾向以及接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新现象开展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着眼于提高青年写作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同时,与会评论家以青年写作为镜,对近年来的当代文学场域、文学体制、青年写作的评论话语机制以及青年批评家群体进行了一次深刻反思与自省。大家认为,要重建青年写作的内在维度,当前文学语境下“青年”概念已经发生变化,“70后”“80后”步入中年,一些“90后”作家呈现疲软与早衰态势,关于青年的“文学想象”与“创作实践”之间发生错位,基于年龄、代际划分而建构的青年身份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批评家必须重新找到定义青年写作的坐标系。要倡导真诚勇敢、新鲜蓬勃、生猛异质的青年写作精神,面对高度同质化、碎片化的生活,青年写作者要对准真实的经验,勇敢讲出自己的故事,也要由自我向外膨胀、转向他者,写身外的生活和历史与想象中的生活,承载起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更应该摆脱主流意识和资本市场对文化生产的规约,推出更具

《玄鸟传》新书分享会在杭举办

本报讯 7月3日下午,由单向空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玄鸟——张柠《玄鸟传》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举办。作家、学者张柠携新作《玄鸟传》,与小说家黄咏梅、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就《玄鸟传》进行了深度解读,探求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和社会史。《玄鸟传》的故事自20世纪80年代始,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孙鲁西的求学经历,全方位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那个急速发展的时代,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空间却日益压缩,小说以现实经验和自由想象的交织,展示了主人公在挫折之中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小说独特的复线结构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将古今中外的思想生动地传达出来,记录了千年以来人类对至高理想的追求。玄鸟不会因现实收效双翼,而是奋力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玄鸟是《山海经》里的一种神鸟,代表精神上的自由和理想主义的生活,这正是对故事主人公孙鲁西的重要写照。黄咏梅认为,孙鲁西与现实格格不入,没办法在世俗生活里获得认同感,但他的内心却更深扎于精神的内核里。翟业军补充了张柠作品中俄罗斯文学的烙印,认为他延续了“多余人”的传统,“即使身边围满了面包,但是如果他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要吃这个面包’的问题,他是一口也不会吃的”。小说人物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生活来源而是精神出路,“他们仿佛有点魂不守舍,但目光又非常坚定”。许多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往往侧重描写其负面形象,但《玄鸟传》中的孙鲁西则因其与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和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呈现了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延展性。作者张柠谈到,他想展现一个追求精神、思考严肃问题的人物形象。《玄鸟传》的副文本“玄鸟录”即涵盖了许多关于现实与哲学宗教问题的思考,展现出了主人公精神生活的演变历程。(蒙若妍 阳佩芝)